

学林出版社

# 历史的意义

[俄]别尔嘉耶夫 著  
张雅平 译





欧洲思想系列

定价: 12.00元

ISBN 7-80616-991-1



9 787806 169919 >



学林出版社

101  
19/0

# 历史的意义

[俄]别尔嘉耶夫著  
张雅平译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的意义/(俄罗斯)别尔嘉耶夫著;张雅平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6

(欧洲思想系列)

ISBN 7-80616-991-1

I. 历... II. ①别... ②张... III. 宗教哲学—研究—西方国家 IV. B9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6816 号

## 历史的意义



- 作 者**——[俄]别尔嘉耶夫 著
- 译 者**——张雅平
- 责任编辑**——黄 晶 曹坚平
- 封面设计**——朱 也
- 出 版**——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64515005 传真:64515005
- 发 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1 楼)  
电话:64515012 传真:64844088
- 印 刷**——常熟市东张印刷有限公司
- 开 本**——850×1168 1/32
- 印 张**——6
- 字 数**——13.5 万
- 版 次**——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 印 数**——5000 册
- 书 号**——ISBN 7-80616-991-1/B·80
- 定 价**——12.00 元

## 出版说明

本书是俄罗斯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关于历史哲学的一部代表性著作。他从历史形而上学的角度出发,对于人类命运的发展规律,人类历史的本质意义进行了深刻的阐释,并重点强调了宗教意义上的神秘精神是维系人类文化永恒性的内在力量。

作为一位经历曲折的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对于历史现实的洞察和批判有着较为深厚的生活基础和漫长复杂的思辨历程,因此也就包含着与众不同的真知灼见,在剖析西方古典文化和各种不同的宗教形态在人类社会发史中所起的本原作用,人文主义的内在矛盾,和现代社会进步学说的本质缺陷等历史命题的过程中,体现了超越历史时段局限的远见卓识。

但是,从根本上讲,别尔嘉耶夫的历史哲学是主观唯心主义哲学,他对宗教神秘主义的绝对强调、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某些批判与否定都存在着较明显的思想认识上的局限性和个人偏见。为了使我国读者能较为全面地了解他的思想内容,编者

尽量保存了他的文本完整性,相信读者在阅读时能作出符合历史的分析与判断。

学林出版社

2001.12

## 前 言

19世纪俄罗斯思想涉及最多的是历史哲学问题。在各种历史哲学体系上逐渐形成了我们的民族意识。而斯拉夫派与西欧派关于俄罗斯和欧罗巴、关于东方和西方问题的争论，成了我们精神需要的中心，这并非没有原因。恰达耶夫和斯拉夫主义分子早已对俄罗斯思想提出过历史哲学的课题，因为俄罗斯、俄罗斯的历史命运这个谜，曾几何时正是历史哲学之谜。看来，构筑宗教历史哲学乃是俄国哲学的使命。自成一体的俄罗斯思想诉诸终极的末世论问题，它弥漫着启示录的情调——这就是它与西方思想的区别之所在，这也首先赋予了俄罗斯思想以宗教哲学的特点。我向来对历史哲学问题情有独钟，世界大战和革命更激发了我这种兴趣，致使我把主要精力投入这方面的研究。于是我拟定了一个计划，要写一本关于宗教历史哲学基本问题的书。把这一计划付诸实施的作法是，我于1919年至1920年之交的冬季里在莫斯科一家私立的精神文化院开办了一系列讲座，每次的讲演笔记就成了这本书的基础。同时我建议把我

1922年写的篇题为《争取生命的意志和争取文化的意志》的文章收入书中，因为这篇文章对于说明我的历史哲学观点非常重要。



# 目 录

## 前 言

第一章	历史的本质·传说的意义·····	1
第二章	历史的本质·形而上学的和历史的·····	16
第三章	天国的历史·神与人·····	34
第四章	天国的历史·时间与永恒·····	50
第五章	犹太教的命运·····	68
第六章	基督教与历史·····	85
第七章	文艺复兴与人文主义·····	102
第八章	文艺复兴的终结和人文主义的危机·机械的引进 ·····	119
第九章	文艺复兴的终结和人文主义的危机·人的形象 的分解·····	135
第十章	进步说和历史的终结·····	150
结束语	争取生命的意志和争取文化的意志·····	168
	译者后记·····	183

## 第一章 历史的本质·传说的意义

世界历史上特定时刻里特别剧烈的历史灾难和骤变,总会引起历史哲学领域的普遍思考,人们试图了解某一历史过程的意义,构筑这种或那种历史哲学。过去总是这样的。世界历史中基督教时代建立的最早的优秀的历史哲学,即仙逝的奥古斯汀的历史哲学,在很大程度上预先注定了历史哲学以后的建构。它恰好与世界史上一个最惨痛的时刻——古代世界的毁灭和罗马衰落同时发生。前基督教时代的另一独特的历史哲学,也是人类所知的最早的历史哲学——但以理先知书,同样是与犹太民族命运中最悲惨的一些事件息息相连的。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以后,人类思想也转向了历史哲学领域的理论,试图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弄清历史过程。历史哲学在日·杰·梅斯特尔<sup>①</sup>和博纳德<sup>②</sup>的世界观中起着不小的作用。我想,无可争辩的是,不仅俄罗斯,而且全欧洲和全世界都正进入一个悲惨的发展时

---

① 杰·梅斯特尔(Joseph Marie de Maistre, 1753—1821),法国政论家、政治活动家、宗教哲学家。——译注

② 博纳德(Louis Gabriel Ambroise Bonald, 1754—1840),法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哲学家。——译注

期。我们生活在历史大变革时代，一种崭新的历史时代开始了。历史发展的整个节奏正在彻底改变。它已不再是世界大战开始以前和追随过世界大战的俄国和欧洲革命以前那样，而完全成了另一种节奏，这种节奏只能称作极危险的节奏，不可能被称作别的。火山的根基原来是在历史的底层土壤中，一切都动摇了，我们得到的是“历史”极紧凑极剧烈变动的印象。我想，这种强烈的感觉对于人类思想和意识重新认识历史哲学的基本问题，尝试建立全新的历史哲学来说，显得尤为重要。我们迈进的这个时代，人类意识将比以往更加关注这些问题。现在集中论述一下这些问题。在论述历史哲学或更确切些说是历史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中最主要的东西之前，我应该作一个导论来分析“历史的东西”的本质。

什么是“历史的东西？”为了解“历史的东西”，为了领会“历史的东西”，认识其意义，必须先说一说二元性。在一些时代，人类精神完整有序地处于某种完全定形、完全僵化和积淀深厚的状态，在这样的时代产生不出哲学问题、历史运动和历史意义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的产生需要相应的敏锐。一个时代的完整存留现象不利于历史认识和历史哲学的建立。历史生活和人类意识中必须发生分化，出现二元性的东西，从而有可能使历史的客体与主体出现矛盾现象；必须有一种主观反射出现，历史认识才能开始，历史哲学的建立才成为可能。因此，我认为，可提出对待“历史的东西”的三个时期的图式。我现在就来确定，每种时期怎样对待历史认识。第一时期是直接地、完整地、有组织地存于某种固定的历史制度中的时期。这一时期对于历史认识来说固然有趣，但历史认识尚未在这一时期萌生，这个时期的思想在其中是静态的，因而客体的纷繁多变性并不能很好地为人类思维所了解。第二时期是不可避免地、灾难性地、随时随处

出现二元性的分化时期。这一时期,业已确立的历史基础开始从根本上动摇,历史运动、历史灾难和历史激变层出不穷,它们可能以不相同的节奏发生,但是井然有序的基调和完整生活的协调已不复存在。于是二元性和分化开始了:认识主体并不感到自身直接和完整地存在于历史客体当中,历史认识之反射开始发生。这一时期对于历史科学是重要的,但对现存的历史哲学体系、对现存的历史过程意义的思考毕竟是不适宜的,因为此时主体和客体之间发生断裂,反射之主体脱离出他直接所在的生活,与这内在生活本身,与“历史的东西”本身脱离。“历史的东西”和认识之间发生矛盾,认识疏远了“历史的东西”的内在本质。这一时期出现了历史科学,甚至可能出现一般文化观上的历史主义。而这正是这一领域中的离奇现象之一(我们下面将不断地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历史的东西”和“历史主义”不可同日而语,它们之间存在很大差别甚至矛盾。历史科学所特有的历史主义往往远离“历史的东西”的奥秘,前者不可能接近后者,历史主义丧失了与“历史的东西”相通的所有能力。历史主义不去认识和了解“历史的东西”而且还否定它。要想着手研究“历史的东西”的内在奥秘(在井然有序的、完整的时代中,尽管人直接生活在这种奥秘之中,却不认识和反射它),要想思考“历史的东西”的意义,必须透过认识主体与被认识客体的矛盾状态,以崭新的方式穿透二元性奥秘,进入“历史的东西”的奥秘。必须回到历史生活的奥秘及其内涵,即历史之内在在灵魂,以便思考其意义,建立真正的历史哲学。这就是第三时期,是回归“历史的东西”的时代。当我说灾难性的历史的时刻对建立历史哲学特别有利时,指的是人类精神上的这样一些惨事,当人类经历了某种生命攸关的历史制度及和谐生活被毁灭的过程,经历了分裂和二元性的时刻之后,才可能把历史中的两种时刻——直接存

在和与之的分化——加以比较和对照,从而向精神的第三种状态过渡。这种状态赋予意识特殊的敏锐,使它具有特殊反射能力,人类精神在这种状态下向“历史的东西”的奥秘转移。这也就是对提出历史哲学问题特别有利的状态。为使我所讲的内容更加明白,这里我要强调,二元性和反射的第二时期虽然产生历史认识,使历史哲学得以建立,但这一时期还不够深刻,还缺乏认清历史奥秘的能力,这一点永远是它的不幸。为此,我应该谈一谈人们称之为人类的文化“启蒙”时代的特征。我们所说的“启蒙”时代不仅指近代历史“启蒙”的经典时期,即18世纪的启蒙时代。我想,所有时代所有民族的文化都要经过“启蒙”时期。所有民族的文化发展中都有一个可知的周期性。这种文化过程的相似性说明文化在发展中的本质特点。希腊文化是人类所知道的最伟大的文化之一,也曾有自己的“启蒙”时期,它内在地与人类18世纪所经历的那个时代相似。智者时期乃是希腊文化的某种繁荣,它完全具有18世纪启蒙时代作为表征的那些特点,尽管曾是希腊特有的特点。大体上说,希腊文化的“启蒙”时代破坏历史上的神圣的东西,破坏了传统文化、历史传说,正如18世纪启蒙时代所起的作用一样。“启蒙”时代在每个民族的生活中乃是这样一种时代:人所固有的自信的理智把自己看得比存在之奥秘、生活之奥秘还要高,比那些生成整个人类文化和世界各民族生活的诸神之奥秘还要高(上述文化和生活像从自己的根里那样由诸神的奥秘中生成)。于是在“启蒙”时代,人类理智开始被置于生活这些直接的奥秘之外或者之上。试图用渺小的人类理性评判世界奥秘和人类历史的奥秘是这一时代的特点。在这种情况下,人自然要脱离历史的直接存在。“启蒙”时代否定“历史的东西”,把“历史的东西”作为特定的现实加以否定。它分解历史,解剖历史,使人的历史不再是使之成其为“历

史”的那种原初的完整的现实。它把人类精神和人类理智与“历史”分开。因此,18世纪的“启蒙”时代曾经是一个深刻的反历史的时代。虽然在18世纪已产生“历史哲学”这一术语(最早由伏尔泰使用),有一大批历史著述问世,但18世纪的反历史主义也十分普遍,这一点根本无须多加说明。惟有19世纪初以反对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为目的的浪漫主义运动、浪漫主义反动,才在历史哲学中真正获得普遍承认,使我们第一次接近历史奥秘,使真正认识历史运动成为可能。只有这种反动才使我们从精神上回归启蒙时代所继承却又消灭了的那些东西,如历史的古老神话和传说。这种反动试图以自己的方式认识和说明那些神话和传说。“启蒙”的理性,18至19世纪启蒙时代的理性,乃是自我肯定自我克制的理性。它不是从内心接近世界历史即历史本身之理性的那种理性,因为真实地存在着一种历史理性,而内在地与之割断联系并站在它头上对之加以评判的便是上述启蒙的理性之所为。“启蒙”的理性谋求充当评判井然有序的历史理性的角色,但事实上,一种高层次的理性应该不仅涵盖一个有序的时代,比如带有许多时代缺陷的18、19世纪所特有的人类自我意识的内容,即人类理性的内容,而且应当也吸收人的原始智慧,接近存在之第一感觉,即生活的第一感觉。这些感觉最早产生于人类历史的初期,甚至前历史生活时期,用所有民族原始阶段所特有的万物有灵论理解世界。这种原始时代固有的智慧随后透过整个历史的内在的、神秘的和深刻的生活,透过基督教的产生,透过中世纪,直至当代。只有这种理性能够了解每个时代所固有的内在光明,只有这种理性将成为真实的、对人有所启迪、使人清醒的理性。然而这种“启蒙”理性在18世纪已经给自己庆过功,这种理性所知甚少,接近内在的东西不多,孤陋寡闻,内在地与大部分历史生活的奥秘相当疏远。“启蒙”理性因其盲

目地自我肯定、自我满足,从而不仅把整个人类的东西划归自己统辖,而且把属性上超人类的的东西也划归自己统辖,这使得它受到内在的惩罚。

在“启蒙”的理性的胜利号角中诞生了一种科学,它将认识主体与被认识的历史客体对立起来,在这个方面成绩斐然:它得以成功地搜集、积累了许多东西,并分门别类地加以认识,然而所有这一切在认清“历史的东西”的最本质方面都深感无能为力,一种过程渐渐发生:被认识的东西本身游离出去,不见了,不再作为那种惟其如此才能被称为“历史的东西”、才能揭示历史奥秘的原始现实而存在。这一过程在历史评论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真正的历史科学只是在19世纪才成为可能,因为在18世纪人们还坚信诸如宗教是由祭司们杜撰出来欺骗人民的说法,而这种情况在19世纪已不可能。同时,上述过程在对教会史的圣书传说所做的工作方面也可以看得非常清楚。这是一个以前曾为禁区的新领域。细看这批判性工作中发生的是一种什么过程是十分有趣的。基督教世界中的一切统统构筑在圣传上,构筑在对这种传说的神圣的继承性上。历史的批判首先破坏了它,这始于改革时代。宗教改革运动率先开始怀疑圣传,不再顾及那些传说,但由于一切改革都必然带有不彻底性,因而留下一部圣经。之后,这种破坏圣传的事情越来越多,最终导致圣经遭破坏。其实圣经正是圣传本身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不是什么别的东西。因此,圣传一旦被否定,圣经也必然被否定。举这个例子是为了说明,为什么这种历史批判对于说明宗教现象本身之奥秘是绝对无能为力的。它围绕着基督教产生的奥秘兜圈子,但无论如何也认识不了它。德国这方面的大量批判文献对于加工各种材料无疑卓有功勋,但即便是通过这样的文献,要认识基督教的奥秘也是不可能的。一切从手中溜走,一切从视

野中消失。曾被吸收进传说的,曾吸收主体加入客体的那种主要奥秘消逝着,留下来的仅仅是已经死去的历史材料。我认为,在教会史领域发生的那种过程,也在整个历史领域发生了,因为实际上不仅有教会上的圣传,而且有历史的圣传,文化的圣传,即神圣的内在传统。只有当认识主体与内在生活不分离的情况下,认识主体才能开始研究生活的内在实质;而如果分离着,则最终应该经过自我否定。这样就不仅得到一些历史碎片,而且历史上一些神圣事物也接连不断地被揭示出来。

我认为,历史哲学领域最有趣的派别之一是经济唯物主义,它的功绩恰恰在于,对揭示历史上神圣事物和历史传说的那一过程(在历史学中始于启蒙时代)作了最后的总结,在这方面彻底地不间断地揭示和扼杀着历史上所有神圣事物和传说,毫不妥协、完全彻底地这样做的。对“历史的东西”的内在奥秘的猜测——始于启蒙时代的、在宗教领域始于改革时代、在19世纪一度繁荣并已作为整个历史科学的成果——已半途而废。所有广义上的唯心主义的历史科学派别,都不能彻底揭示和扼杀历史传说。原本什么样的历史碎片照样还是那些碎片,只有经济唯物主义怀疑一切传说、一切圣书历史继承性,以革命的极端形式最彻底地反对一切“历史的东西”。经济唯物主义观点认为,历史过程最终表现为精神的消失。灵魂的内在神秘和内在的奥秘生活无论何处都不会再有。对神圣事物的怀疑引发出一种观点,即物质的生产过程乃是历史过程惟一真实的现实,由生产产生的经济形式是惟一本体论的、真正第一性的和现实的,其他一切事物不过是第二性的,不过是映象,是上层建筑。整个宗教生活、精神文化,整个人类文化、艺术,整个人类生活,都只是反映、映象,而不是真正的现实。

使历史丧失应有的精神,通过揭示历史的主要奥秘扼杀其



内在奥秘的最后过程正在发生。按照经济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的主要奥秘就是物质生产的奥秘,是人类生产力的增长。由此,“启蒙”时代业已开始的批判性破坏工作得以贯彻到底:它否定“启蒙”本身,因为经济唯物主义从“启蒙”的理性主义形式上,即中世纪已达到繁荣的那种形式上克服它,论证一种独特的历史进化论,从而将“启蒙”道路上的繁荣也显露出来。再往前已无路可走,经济唯物主义清醒地发现在这条路上不可能获得有关内在命运、民族精神生活的奥秘,不能认识人类的命运。人类的命运作为一个问题被简单地否定了,它只被认为是一个由可知的经济条件产生的不切实际的问题。然而经济唯物主义在这里暴露出一个基本矛盾,这一点它自己也没有想到,因为它没有能力跳出这个矛盾。不过否认这种哲学裁判学说的人却看到了这一点。

事实上,如果经济唯物主义认为所有人类意识不过是经济关系的上层建筑,那么,那个充当经济唯物主义的直接代言人的理性——高踞于经济关系消极反映之上的理性又是从哪里来的?经济唯物主义学说追求的是一种理性,它可以超出经济关系的消极映象。但如果经济唯物主义作为思想学说仅仅是可知的生产关系的反映,比如说是19世纪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基础上的那些关系的反映,那么,经济唯物主义的代言人用什么方式能够获得比也是这一映象的其他仅仅是自欺的学说体系更大的真实性呢?这一点人们不能理解。这大概是当时那一经济现实引起的幻想之一。因此在经济唯物主义中,对“启蒙”理性的追求和自我主张得以贯彻到底。经济唯物主义认为,具有一种启蒙的和教育的理性,它高于人类的世界历史命运和整个精神生活,高于所有人类意识形态,所有事物都是它们的假象和幻想,而这些假象和幻想是如理性本身那样的经济过程的反映